

城市的“硬盘”

我们两人一个在上海读了十年书，另一个更是地道的上海人。虽然离开上海已有不少年头，但依然关心她的变化。前阵子上海的朋友们告诉我俩一件不很有趣的事情。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上海人”（即土生土长的土著）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地人”（即非土著）有了一个新的蔑称——“硬盘”。这一称呼源于“外地”一词的汉语拼音缩写WD，由于WD也是一个知名硬盘品牌的字头，“硬盘”遂成为一些上海年轻人用以指代“外地人”的隐语。几乎与此同时，近几年要求保护上海独特文化（比如上海话）的呼声日趋强烈，部分“上海人”对“硬盘”们的歧视（特别是网络上的语言暴力）也开始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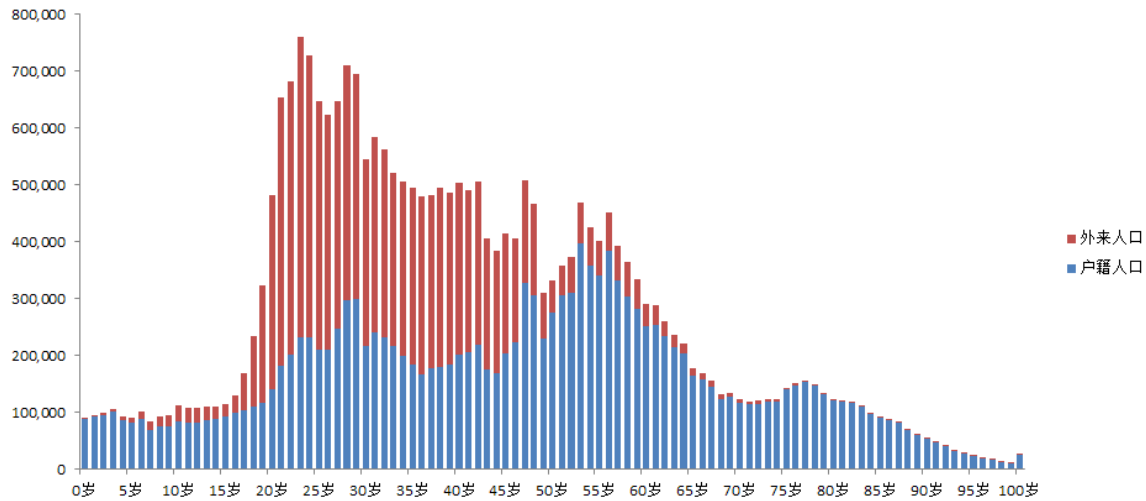
或许很多人会说，“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由来已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错，早在户籍制度尚未放松的计划经济年代，“乡下人”是“上海人”对所有非上海土著的内地同胞的统称。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和户籍制度有针对性的放宽，哪怕是最保守的“上海人”也意识到“乡下人”这一称呼的粗俗和狭隘。其中的原因很多，下面还要做详细分析，但最主要的变化显然是高素质人才的流入。从1996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就业不再服从分配，高素质人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留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从此，“乡下人”不再低人一等。事实上，这十多年来，高学历的“乡下人”已经成为上海中产阶层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个人修养和工作能力得到了绝大多数“上海人”的认同，普通话正逐步代替上海话成为主要的工作和生活语言。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硬盘”说会在“全国化”的趋势下逆势而起？从积极的角度讲，这是新一代“上海人”的本地文化觉醒。从批评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硬盘”们眼中，这是新一代“上海人”文明程度的倒退。我们的视角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过去十多年间“乡下人”这一称谓的淡出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化和有限户籍改革的“帕累托”性质，无论“上海人”还是“外地人”，都从中获益。但是，有限户籍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硬盘”一说的兴起其实是经济发展和城市文明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要实现人才在全国范围的有效配置，要实现全体国民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平等权利，就必须直面“硬盘”说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

先来看上海本地保护意识消退的九十年代后期和本世纪的前几年。图1画的是2011年上海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由于生育率长期偏低，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2011年的平均年龄已有47岁，60岁以上居民的比例也接近三成。相反，外来人口以年轻人为主，17岁到40岁的比例高达74%。如果没有外来人口，长此以往，上海可能会慢慢消失。虽然不是每个本地人都会在意百年以后上海的命运，但年轻“硬盘”们的到来为“上海人”来了实在的好处。高端人才的流入是上海继续成为全国经济金融中心的保证，外来普通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互补性又很强。此外，中国推行“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年轻，也因为他们的流动性，“硬盘”们总是付出的多，获得的

少，他们的税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本地人的一种补贴。还有，直到最近几年，户籍制度依然极大限制了“硬盘”们平等享受公共产品的权利。由于社会福利体系大多与户籍挂钩，对于常住上海而没有上海户籍的居民来说，无法享受一系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外地人”虽然为上海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却不与“上海人”分享有限的公共资源。对于“硬盘”们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限制，大多数上海人心知肚明，排外情绪自然得不到广泛支持。

图 1: 上海市户籍和外人人口年龄分布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硬盘”们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废除歧视性公共政策势在必行。最近几年上海公共政策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为“硬盘”们提供更多的服务。2009年，上海市政府发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并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缴纳所得税满7年的外来技术人员可以通过申请获得上海户籍。这是开放上海的一大步。此外，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的制度也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很多人都有切身体会的例子就是上海市先后放松了公立幼儿园和小学的入学限制。比如根据上海市教委2011年公布的数据，在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中，非上海户籍的学生已经超过一半。至此，“外地人”就不再是对上海经济只贡献不分享的人群了，他们开始与“上海人”竞争宝贵的公共资源。

其次，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户籍在就业方面的作用也大为降低。户籍从来就不是影响普通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即使是专业人士，上海户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已不再重要。“上海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得不和“外地人”竞争那些他们梦寐以求的职位。根据综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海居民的名义工资收入在2008年至2011年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而根据2011年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对上海外来人口进行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调查覆盖2万4千名外来人口），上海外来人口这三年间的名义工资收入增速高达13%，由此可

知，户籍人口的收入增长一定比 9%更低，“上海人”经济上的危机感正在取代从前的优越感。

再以高等教育为例。复旦大学虽然直属于国家教育部，但直到 2006 年，所有 3420 名新生中竟有 1610 名上海生源，比例高达 47%！2008 年教育部作出明确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 30% 的应逐步回调至 30% 以内。复旦大学在 2011 年以后终于达到了这一要求。虽然复旦大学的生源质量终于得到了提升，但上海户籍的含金量却再度缩水。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结论：重新抬头的地方保护主义情绪其实是对废除歧视性政策的一种反弹。如果要为地方保护主义寻找理由，那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上海究竟是上海人的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呢？按理说，这是个无理的问题。中国大陆原本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区，中国人在中国大陆有迁移的自由和权利。在统一国家之内，上海市作为一个地方单位，没有权力区别对待中国公民和上海市民。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中国公民的迁移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对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力范围也缺乏明确规定。因此，上海究竟是上海人的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就变成了行动中各方博弈的问题了。而政府也只能基于户籍制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来做相应的政策调整。

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讨论过于复杂，如果单从经济角度来看，上海逐步降低“外地人”移居上海的门槛，背后是否存在经济理由呢？作为一个经济生命体，一座城市，如同一家企业，只有源源不断地吸取新鲜血液才能保持活力。如果城市之间面临着成为中心城市的竞争，那就更需要通过开放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上海虽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经济金融中心，却并非没有竞争对手。比如深圳在金融方面就大有赶超上海的势头。深圳在吸引外地人才方面的政策相当开放，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深圳人”原本并不存在，对外地人的歧视也就无从谈起。城市间的竞争是促使上海调整外来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在经济赛跑中落伍，“上海人”的福利最终也会受损。

与上海类似，香港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公共资源稀缺等问题。同时，香港也在努力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上海不同，香港在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内地存在天然的藩篱，很少香港人会质疑“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这藩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香港的独特性和香港人的利益，但却可能妨碍香港充分利用和吸收中国内地的经济资源。香港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上海前面。但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包括人才）已到了不容忽视的情况下，如果不进一步对中国开放高端劳动力和高等教育，香港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如何扩大城市的“硬盘”，以令城市这部主机更具竞争力，实在是考验一座城市领导者和全体市民智慧的难题。

(作者：赵扬 宋铮)